# 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机制探析
## ——权力来源与政策实践

孙成昊　王叶渭　董一凡

内容提要：世界对相互依赖的认知正转向“不安全感”，本文旨在探究近年兴起的“相互依赖武器化”现象。不同于既有研究针对对象国“脆弱性”和“敏感性”特性的描述，本文尝试从发起国视角，分析国家何以能将相互依赖转化为对抗武器。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发起国在相互依赖网络中的轴点优势和断线能力是武器化的权力基础。基于此，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可进一步划分为市场型权力、资源型权力和通道型权力三种类型。在相互依赖网络中，不同国家所控的轴点会相互制约，但当同一行为体同时控制多种类型节点时，其权力将产生叠加效应。对应三种权力类型，发起国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各异。运用市场型权力施加政策的核心在于，发起国减少或切断与对象国市场间的联系；运用资源型权力的政策则反之，即减少或切断对象国的资源供应；运用通道型权力的政策表现为限制对象国通过、离开或使用发起国所控节点。文章选取欧盟在不同时期对俄罗斯相互依赖武器化这两个关注度高且具有差异性的案例进行分析，以证明本文理论框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相互依赖武器化　全球经济网络　欧盟对俄制裁

## 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各国间编织起紧密复杂的经济相互依赖网络。在过去，国家的主流倾向是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与经济合作，并将经济这一低政治领域的交往作为安全、防务等高政治领域的稳定器或助力器。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主权行为体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为一种经济对抗武器，许多国家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态度正发生明显转变。例如，美国明显增强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安全因素联结的重视，以高度政治化、安全化视角来评估经济依赖关系，希望通过开启新的地缘经济博弈

来保持其持久安全和实力优势，[①]将相互依赖转化为武器的行为现象愈发频繁。特朗普任内，美国利用其在金融网络的中心地位对他国发起“极限施压”；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联合盟友伙伴利用俄罗斯在各领域对西方的依赖推出一系列制裁措施，将“武器化相互依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作为国际关系中“无处不在”的实践方式。[②]

在此背景下，“经济压舱石”的概念不断遭到质疑，相互依赖“武器化”（Interdependence Weaponization）成为热议的新主题。在政策界，这一概念早在 2015 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中就有所体现。该报告将欧盟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对土耳其贸易和旅游限制等措施形容为“武器化相互依赖”，而后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慕尼黑安全会议年度报告等都曾提及这一概念。相互依赖武器化现象虽然受到关注，但其概念和讨论范围仍需厘清，“如果仅根据公开评论来判断相互依赖武器化，那么任何东西都已经武器化”，就会导致相关讨论扩大和泛化。[③] 目前，学界对相互依赖武器化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本文认为，国家利用相互依赖中他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通过主动切断或减少相互联系，以谋求损害他国利益或以此施压达成改变或影响他国政策，实现本国政治、安全等目标的行为，可以称之为“相互依赖武器化”。有关该问题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从既有研究成果看，自由主义理念仍在相互依赖研究中占据较大篇幅，而对相互依赖被武器化和工具化的现象探究不足。并且，相关经济工具研究仍以制裁为最主要研究对象，偏好关注双边或一对关系，而缺乏相互依赖网络结构的视角。

重新审视相互依赖现象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影响，既契合现实发展情况，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当前的研究空白。“相互依赖武器化”主题所涉研究问题较为庞杂，本文将着重围绕“国家何以能将相互依赖作为对抗武器”这一问题，尝试厘清发起国（initiator）得以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来源，以及不同权力来源所映射出的作用于对象国（targeted country）的不同政策形态，并使用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不同时期将欧俄之间的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检验。

---

① Mark Leonard ed., *Connectivity Wars: Why Migration, Finance and Trade Are the Geo-economic Battleground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6.

② Daniel W. Drezner, “Economic Statecraft in the Age of Trump,”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2, No.3, 2019, pp.7-24.

③ Daniel W. Drezner,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ed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1, pp.12-19.

## 二 文献述评

有关相互依赖主题的研究偏好深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间建立深化相互依赖的利弊存在不同观点。为便于理解相关研究脉络，本部分将首先回顾以往与相互依赖有关的研究所采用的不同范式以及对相互依赖现象的立场演变，以揭示传统研究视角对当下现实情况的解释力有所欠缺的问题。其次，本部分将介绍针对本文研究问题的相关解释，梳理既有研究为什么未能回答“国家何以能将相互依赖作为对抗武器”。

### （一）从相互依赖的“有益”到“有损”

纵观“相互依赖”主题的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由主义范式主导了该主题研究，相关成果远超其他流派。此类研究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同步，或是认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相信对外开展贸易、投资等合作对国家有益，或是探索对国家间相互关联性的测度方法，将相互依赖视为一个不具有价值取向的研究客体。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1977 年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奠定了当代对相互依赖问题研究的基础，也正式开启了相互依赖能够抑制冲突的讨论。基欧汉和奈认为，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是比现实主义世界更为理想的模式，在其中，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类问题间不存在明确等级区分，武力并不是占主导的政策工具。① 对于各国间建立经济相互依赖的推崇最初来源于资本主义对商业精神的肯定，如孟德斯鸠认为商业的结果就是导向和平，两个相互贸易的国家将自然地相互依赖，所有的结合都是基于其共同需求，赫希曼则指出资本主义会抑制、减少人性中导致灾难的破坏性成分。② 而后，虽然自由主义各分支观点略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在这一自冷战后期开始的阶段中，相关研究多将相互依赖与和平挂钩，其中“商业和平论”或“贸易和平论”可谓盛极一时，其观点主要包括相互依赖的信贷和商业契约为世界创造财富，存在经济交换关系的国家会基于成本代价考虑而不愿以冲突方式解决问题。部分观点还认为，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对促进和平的国家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 页。

② ［美］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冯克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1-75 页。

宪法亦有正面影响，这将最终遏制国家发起“征服”行动，促进国际和平。① 另外，也有部分研究者并未对相互依赖有益与否给出价值取向判定，而将相互依赖现象作为一个中性的研究客体，聚焦于如何运用贸易、金融等交易数据衡量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程度。②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美国长期受益于不对称的相互依赖，而受到美国学界关注重点所框定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议程也因此更偏向“相互依赖有益说”。随着美国从外部相互依赖中的相对收益下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国家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的演变，研究界逐渐开始转向关注相互依赖的负面性。

实际上，赫希曼在其经典著作《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的结构》中已提出，一国的对外贸易优势能够扰乱他国贸易，还可能成为国家外交优势的来源，③而基欧汉和奈的著作中所探讨的相互依赖概念也同样指明，各方需要为相互影响付出代价（costly effect），相互依赖并不局限于互利（mutual benefit）的情境。④ 一方面，相互依赖对国内政治存在负面影响，如国家内外政策自主性受到外部制约，利益外向型部门或将占据国内政治生活特权地位等；⑤另一方面，相互依赖和国际冲突的关系也被重新思考。相对于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学者提供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相互作用的多重性会增加无政府主义世界中可能出现的摩擦数量，更强调相互依赖的潜在代价以及经济关系可能产生的权力不对称和摩擦，⑥并通过历史统计数据发现残酷的战争更可能发生在贸易相互依赖程度更高的国家间。⑦ 在体系层面，自由主义体系的维持依赖完备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这需由霸权领导者提供稳定的协

① 相关研究如下：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39; Solomon William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4, Issue 1, 1980, pp.55-78; Robert O. Keohan,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in John Dunn, ed., *The Economic Limits to Modern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65-194. Camille Castorina, “Cobdenism for the 1980s,” *Economic Affairs*, Vol.5, Issue 2, 1985, pp.58-60;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相关研究如下：Peter J. 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Some Long-term Trends and Recent Chang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9, Issue 4, 1975, pp.1021-1034; John R. Oneal et al, “The Liberal Peace: Interdependence,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50-8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3, Issue 1, 1996, pp.11-28。需注意的是，此类研究多忽视了相互依赖关系中各方均需承担义务和代价，而将相互联系当作相互依赖。

③ Albert O. Hirschman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④ [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9 页。

⑤ 参见苏长和 《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载《欧洲》，1998 年第 4 期，第 36-37 页。

⑥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9; Joanne Gowa,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⑦ Melvin Small and J. David Singer, *Resort to Arms: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 1816-1980*,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102.

调服务和公共产品，而当其领导能力无法保证时，国际格局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① 在国家认知层面，相互依赖程度越高的国家对与其相互依赖的国家越怀有敌意。此外，还有部分观点结合上述两种看法，将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变化作为研究冲突决策的中介变量。包括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部分利益相关的国内部门会由于相互依赖被中断或担忧被中断，而推动对外政策的冒险主义，最终导致国家选择使用武力夺取资源。②

不对称性关系根植于国家间相互依赖，但从现实主义、权力博弈角度进一步探索相互依赖的视角是近年才兴起的。更需注意的是，基欧汉和奈也曾指出，“相互依赖是一种权力来源”。③ 然而，此前研究一是未能全面回答相互依赖被作为国家竞争工具或政治杠杆的原因、具体操作方法和有效性；二是仅将其视为政治杠杆而忽视国家利用相互依赖直接遏制对手、削弱对手实力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已初步探析“国家何以能将相互依赖作为对抗工具”这一问题，而对于“由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影响他国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的着墨不多。正如《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两位作者所指出的，衡量权力的方式有二：一是使用实际结果进行衡量；二是使用资源和潜力进行衡量。现有解释事实上可被归类为两种视角：一种关注对象国潜在损失的评估；另一种关注发起国具体的政策行为。

（二）围绕对象国的潜在损失

相互依赖中蕴含非对称性，这意味着相互依赖中的“弱者”面对关系破裂的损失更大、谋求替代成本更高、操作更难，因而维护自主性以及维护外交和安全的能力和手段将更为有限，进而受制于“强者”的影响。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和奈选择使用实际结果对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潜在权力进行衡量，进一步提出“敏感性”“脆弱性”这两个尺度。具体而言，敏感性指行为体在试图改变局面而作出政策变化前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即在某一固定政策框架内作出反应的速度；脆弱性则指行为体因外部事件作出政策变化后，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所付出的代价。④

---

① Barry Buza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imits of the Liberal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4, 1984, pp.597-624.

② 相关研究如下：John J.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66, No.2, 1990, pp.35-50; Paul A. Papayoanou,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ritain, Germany, and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4, 1996, pp.42-76。

③ [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1页。

④ [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1-18页。

受基欧汉和奈最初探讨相互依赖特性方式的影响，大部分针对该问题的回答也同样基于对对象国潜在损失即代价的评估，主要包括四类观点：第一，以对外贸易水平衡量脆弱性，如贸易伙伴国少的国家比贸易伙伴国多的国家更易受到贸易中断的影响，①而战略产品测试（strategic goods test）方法则强调评估对潜在对手战略物资的依赖程度和补偿替代能力，②能源、食品等战略性贸易产品的替代性越低则依赖越大。③第二，以与潜在对手的要素价格联系衡量“垂直相互依赖”（vertical interdependence）程度，认为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体间的要素价格朝同一方向移动，其运动同时性和相似性越大，则相互依赖程度越高。④ 第三，强调国家自身特征对代价的承受能力，包括经济规模、政体形式、政治稳定性、国内利益攸关方行为都会影响国家被切断经济相互依赖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⑤ 第四，指出盟友和非盟友国家对消极经济政策有不同反应，国家更可能向盟友而非对手妥协，这是由于国家对于和对手出现零和冲突有更高预期，因而更不愿通过在收益上让步来解决问题，而盟友则对声誉和相对受益更为敏感，更愿意付出成本以防止陷入僵局。⑥

（三）围绕发起国的行为逻辑

如上所述，既有研究对于衡量对象国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已进行了较充分的操作化探索，然而从发起国角度评估其所掌握权力的研究却非常少见。围绕发起国利用相互依赖实现自身诉求的行为逻辑，此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目的和具体政策行动两大方面，而契合“相互依赖武器化”的研究则于近年刚刚兴起。

既有研究已认识到，经济实力和相互依赖是一种“权力”，既可作为施加政治影响的杠杆，又可凭此对对手国家遏制打压。一方面，由于军事行动的成本更高，国家倾向于使用经济手段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杠杆。需要说明的是，发起国希望达成的目标不

① Albert O. Hirschman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Stein, “Interdependence: Myth or Reality,” *World Politics*, Vol.26, Issue 1, 1973, pp.1-27.

② Jean-Marc F. Blanchard and Norrin M. Ripsman, “Measuri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Geo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Vol.1, Issue 3, 1996, pp.225-246.

③ 熊炜《失重的“压舱石”？经贸合作的“赫希曼效应”分析——以德俄关系与中德关系为比较案例》，载《外交评论》，2019 年第 5 期，第 81-103 页。

④ R. Rosecrance et al, “Wither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1, No.3, 1977, pp.425-471.

⑤ 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gendas for Research,” *Security Studies*, Vol.9, No.1-2, 1999, pp.288-316; [美] 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等《反思经济制裁》，杜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7-128 页; Bruce W. Jentleso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Post-Cold War Conflicts: Challenges for Theory and Policy,” in Paul C. Stern and Daniel Druckman, ed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olution After the Cold War*, National Academic Press, 2000, pp.123-125。

⑥ Daniel W. Drezner, “Allies, Adversaries, and Economic Coercion: Russi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Since 1991,”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3, 1997, pp.65-111.

仅包括使敌国让步，也蕴含向本国国内或所在联盟说明其立场态度的意涵。发起国会利用非对称相互依赖施加经济损害（如切断或减少联系），威胁对象国政府改变其政策，①还会借“伤害”与对手国的相互依赖展示自身和盟友不满，显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决心。霍夫鲍尔（Gary Cyde Hufbauer）等人就在其著作《反思经济制裁》中特别表明，“美国总统非得（借经济制裁）戏剧性地声称他们对他国不义之举或恶行的反对”，其目的就在于向国内公众展示其愤慨，激发公众爱国热情，并打消同盟国家对美国是否会遵守国际承诺的疑惑。② 此外，也有研究利用讨价还价博弈理论（theory of bargaining），认为将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作为“对抗工具”的有效性有限，具有不对称相互依赖优势并不等于政治影响，发起国将其优势作为换取政治让步的经济资源则更有可能成功。③ 另一方面，国家利用相互依赖对他国实施损害性质政策的原因还可能是寻求改变对象国国家的能力。第一，领导国的经济遏制（economic containment）策略将直接对挑战国造成损失，削弱其经济实力；④第二，发起国通过对特定商品或产业的攻击，如切断高科技或军用产品交换，能够削弱或抑制对象国军事能力；⑤第三，发起国还能通过经济打压政策向对象国内部反对派集团传递信号，使其国内产生更大压力，诱发政治变化。⑥

以发起国行为逻辑为视角的另一研究重心是发起国使用其权力的具体政策形式。经济战、制裁、胁迫、强制等词均是常见的对外经济政策用语，但不同学者对其具体涵盖范围有不同定义，也时有混用情况存在。经济策略成功与否在于能否击中受制裁国的要害，针对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手段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和政治效果不同。使用对外贸易关系作为其权力来源是最常见的传统手段，国家能够借此战略性调整其贸易结构以追求潜在权力，并通过减少商品供给、战略禁运等方式影响对象国。⑦ 由于贸易限

① Mark J. C. Crescenz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Books, 2005, p.51.

② [美]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等《反思经济制裁》，第6-8页；Joseph G. Garvin III, “Economic Sanctions: Foreign Policy Levers or Signals,” *Cato Policy Analysis*, No.124, November 7, 1989, https://www.cato.org/policy-analysis/economic-sanctions-foreign-policy-levers-or-signals。

③ R. Harrison Wagn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argaining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p.474.

④ Dong Jung Kim, “Economic Containment as a Strateg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Issue 6, 2019, pp.1423-1441.

⑤ Richard J. Ellings, *Embargos and World Power: Lessons from America Foreign Policy*, Westview Press, 1985, p.8.

⑥ William H. Kaempfer and Anton D. Lowenber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 Public Choice Approac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iew*, Vol.78, No.4, 1988, pp.786-793.

⑦ 相关研究如下：Jean-Marc F. Blanchard and Norrin M. Ripsman, “Measuri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pp.225-246; Albert O. Hirschman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Richard J. Ellings, *Embargos and World Power: Lessons from America Foreign Policy*。

制政策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象国市场情况，且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在国际上不被认可，当今国家更倾向于使用金融、财政制裁手段，该类措施更易于削弱对象国重点工程建设能力或减少政府官员的个人收入。21 世纪初，学界和政策界还提出了“定向制裁”（targeted sanction）和“巧制裁”（smart sanction）的新概念，这种新方式相较于传统制裁手段更为精细、更聚焦于目标对象，从而能降低全面制裁带来的人道主义成本并增加制裁有效性。①

如上，相互依赖的武器化现象早已存在于国际关系的互动中，如尼古拉斯·兰伯特（Nicholas Lambert）在对英国贸易政策的论述中就提到，英国在一战前利用其在国际贸易相关的通信基础设施垄断地位，制定扰乱对手经济的计划，使全球贸易体系武器化。② 但“相互依赖的武器化”或“武器化的相互依赖”作为学术概念却是近几年才被正式提出。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L. 纽曼（Abraham L. Newman）2019 年在《国际安全》发表的《武器化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网络如何塑造国家强制》一文首次提出“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这一概念，认为相互依赖的经济网络（如金融网络或高科技产业网络）造成国家间持久的权力失衡，网络结构的不对称为“武器化相互依赖”创造条件，一些处于网络枢纽节点（nodes）的国家（如美国和部分欧盟国家）能够利用相互依赖胁迫其他国家。③ 2021 年出版的由丹尼尔·W·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亨利·法雷尔、亚伯拉罕·L. 纽曼共同主编的《武器化的相互依赖使用与滥用》一书，集结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武器化的相互依赖，认为大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关键经济和社会网络的武器化越来越感兴趣。在中国国内，对这一话题的学术探讨也开始浮现，在理论探索上，赵晨在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硬权力”和“巧权力”之外提出“蛮权力”，以描述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意指在本应发挥软权力的领域投射硬实力，将自己的软实力武器化，以更综合的手段强迫对手接受己方意志。④ 任琳和孙振民认为，霸权国将不对称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断网”行为是霸权国近年来经济安全化的显著特征。⑤ 吴限区分了新型网络化制裁和“武器化的相

① Daniel W. Drezner, “Sanctions Sometimes Smart: Targeted Sanc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3, No.1, 2011, pp.96-108.

② Nicholas A. Lambert, *Planning Armageddon: British Economic Warfa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88-89.

③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1, 2019, pp.42-79.

④ 赵晨《特朗普的“蛮权力”外交与美欧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11 期，第 71-75 页。

⑤ 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6 期，第 83-109 页。

互依赖”，并解释了限制新型网络化制裁使用的因素。① 田野和安怡宁提出国际制度武器化中存在剥夺、解耦与抗衡主导国三种机制选择。② 另外，部分研究者选择分析颗粒度更小的经济问题分支，或探究不同商品门类的贸易武器化与反武器化，③或将相互依赖武器化概念应用至对美国多边出口管制合作、④美对华科技竞争⑤的具体案例研究中。

（四）小结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研究中，对相互依赖益处的认知逐渐转变为因其潜在不对称性所产生的不安全感，相互依赖遭到武器化以及被作为对抗博弈工具的问题逐步得到关注，但相关研究仍较为匮乏。

首先，更多研究聚焦于双边经济相互依赖的评估或具体案例分析，而缺乏对当今全球经济网络结构的关注。网络概念强调每一个个体和其他个体的联系，以及个体与结构的关系，这不仅使部分在网络中处于优势位置的国家的政策能够越过其他行为体产生垄断性结果，还使各领域间的“可交易性”上升，即拥有不同“地位”（position）和“角色”（role）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可以在不同议题间进行“讨价还价”。亨利和纽曼所提出的武器化概念引入网络结构作为“武器化相互依赖”的基础条件，可谓是对这一问题解答的一大进步，但其对网络权力的关注又导致对双边互动的忽视。如两位学者提出“扼流闸阀效应（chokepoint effect）”和“环形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⑥是网络权力的新形式，并以节点和连线多少来衡量其掌握权力的大小，但却弱化了节点本身市场和资源权力的存在。

其次，针对经济战、经济制裁、经济强制等传统经济工具的研究本身已经非常充分，但随着国家经济方略发展演变，既有研究已不足以覆盖新兴现象，具体体现于工具、目标和效果三个方面。第一，新近提出的政策工具范围更广，除运用硬性经济惩罚措施外，还包括利用软性规制力量影响他国。比如，网络型权力中蕴含能够影响整体

① 吴限《新型网络化制裁的结构性限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1 期，第 132-158 页。

② 田野、安怡宁《国际制度武器化的机制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 11 期，第 24-60 页。

③ 陈绍锋《国家间商品贸易的武器化与反武器化》，载《国际政治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70-91 页。

④ 潘锐、谢琛《网络性权力与美国主导的多边出口管制合作——基于产业网络视角》，载《国际关系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42-66 页。

⑤ 丁泰夫、高飞《“相互依存武器化”背景下的泛安全化解析——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为例》，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81—107 页。

⑥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p.54.

市场规则的“结构性权力”,①进而影响对象国;再如,霸权国的经济政策往往对其盟友企业具有潜在影响,其政策转变常引发跨国企业的自发追随。第二,“相互依赖武器化”显然蕴含使用武器攻击他人的含义,其“伤害”意图更深,不仅为改变对象国行为,更为巩固自身相对优势而削弱对象国能力。相比之下,经济制裁、经济强制则多是为了或宣称为了某一确定的政治目标服务。第三,新型经济手段以复杂网络结构为基础,施动者的“显著性”不仅体现于其直接或邻近连接,还体现于那些涉及通过中介节点的非直接连接,②因此发起国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行为不仅对与之直接相连的对象国产生影响,也由于发起国在网络中的相对中心位置而使之对其他第三方节点都具有权力,权力更大、溢出影响也更广。

最后,对于“相互依赖武器化”过程中对象国和发起国的特征,现有研究缺乏连接起两者的统摄性解释。如上文所提及的,相互依赖中的权力来源可以通过发起国掌握何种资源、对象国具有何种特征两个问题来理解。二者实为一体两面,其最终逻辑都源自相互依赖网络结构赋予节点和连线的新型权力,“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完整逻辑链条应是发起国掌握某种权力并实施政策,对象国因具有脆弱性和敏感性而受到影响。然而,现有解释对权力来源的解释不够全面,尤其是过于倚重基欧汉和奈所提出的“脆弱性”“敏感性”两个维度,且未厘清掌握何种权力资源会导向何种政策结果。

## 三 理论框架

在相互依赖网络中,发起国和对象国都属于这一结构中的“施动者”。从施动性概念出发,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发起国国家行为,为本文所阐述的“三层次”权力逻辑提供更清晰的理解框架。现行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施动性概念具有三个层面,其位置性、主体性和策略性是相互统一的。③ 如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本研究,则体现为:首先,发起国的位置即其在相互依赖网络中的位置、其所占据的节点相对大小和连线相对数量多少基本决定了其权力多寡;其次,发起国因希望改变或维持现状(或其他目标),而选择“发起”行动,即选择将原本中性的相互依赖武器化,此时其潜在的权力转化为三种

① [英]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0-243 页。

② 参见 Noah E. Friedk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Centrality Meas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6, No.6, 1991, pp.1478-1504。

③ 朱立群、聂文娟《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2 期,第 4-19 页。

具体的权力类型;最后,发起国根据不同场景、对象国、所掌握权力类型等有策略地制定不同形态的政策。

接下来,本部分将逐一对发起国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不同层次权力来源进行分析,梳理发起国视角下相互依赖被武器化的机制,并将其与对象国视角下的既有理论进行对接,最终尝试描绘出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完整机制。

(一)权力基础:相互依赖网络的"节点"和"连线"

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的集合,由"节点"和"连线"这两个基本要素组成,国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根植于这两个基本要素。

节点(nodes)是对社会网络中行为体进行抽象所得到的概念,任何社会单位或实体都可以被视为一个行为体或节点,不受限于其性质或大小,包括团体中的个人、企业中的部门、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等。在社会网络中,各行为体和他们的行为是相互依赖的,而非相互独立或自治的个体。根据其关系紧密程度,多个节点或能够凝聚成为"子群"(subgroup),区别于其他和该子群联系更松散的节点。

连线(edges)①是使行动者相互连接的联系,其范围和类型多样,既可以是武器、货币或疾病等物质性转移、传输的通道,也可以是评价、信息、规范、影响力等非物质性互动或建立关系的渠道。需注意的是,虽然有向和无向的连线(关系)均存在,但连线的存在意味着其并非某一节点或行动者的特征,而必定是两个及以上节点保持联系时才得以存在的一种共同特征。②

这两个要素是世界相互依赖网络中,国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基础。在这一网络中,节点处于不同的、相对不对称的位置。如果在网络中,某个节点特别"引人注目",则被认为具有显著性,本文将这样的节点称为"轴点"(hub nodes)。一方面,轴点对与之相连或邻近的其他节点具有强影响力。轴点与其他节点连线的数量多、联系值大或频度高(即强度高)③、路径长度短、处于关键中介地位等特征都反映出其中心

①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通常用"edges"来表示"连线",即网络中两个节点之间无论有向与否的连接关系,而"lines"通常表示无向图中的两节点间的连接;"walks""trails""paths"则分别表示从一个节点到另一节点的不同形式的"行走"路径。

② [美]戴维·诺克、杨松《社会网络分析(第二版)》,李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③ 此处的"联系值大",指的是两个节点之间连线所承载的值大,属于"强联系"。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网络大多数为加权网络(weight network),网络中行为体(节点)之间的联系(连线)具有权重,而不是无权联系。比如,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如何,不应仅凭是否存在贸易关系(无权),而应根据贸易额度大小(有权)来判断。

性,①其行为将通过对外连接传递给其相连或邻近节点。另一方面,轴点能够对网络结构施加更大的塑造力和影响力。节点间的持续关联和互动会形成系统和结构,而轴点对整个网络结构都有更大的影响能力,所形成的结构具有独特性和稳定性,进而对网络中的信息流动、运转规则、观念基础加以塑造。

在国际关系中,个人、企业、国家、国际组织等均属于节点,一个节点也可能被多方行为体共享,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也是相互依赖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或行动者。如上所述,各国家节点在网络中相互连接、相互依赖。比如在国际贸易中,任一国家市场即为一个节点,两国间进出口即为连线;在通信关系中,任一基站即为一个节点,光纤、光缆及其所搭载的信息即为连线。各国在网络中分布不同、有不同位置,占据网络轴点的国家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更大影响力,并对整个网络结构有更大塑造作用。

本文不希望以孤立的视角观察经济的某一切面,当前已形成的全球相互依赖经济网络是多层相关的,其中并非只有一种类型的节点,即使仅针对一种产品的交易,其过程同时有赖于交通、金融、贸易等多种网络结构,以及多个运输枢纽、交易平台、签订合同的企业等不同节点类型。以能源为例,如要探讨美国在该领域是否具有能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则需同时讨论其市场节点在能源贸易网络中的进出口份额、其港口或航道节点在交通网络中的中介位置、其货币或交易系统在金融网络当中的关键地位等。

(二)权力来源: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权力类型

节点和连线本身是网络中的客观存在,并不天然具有武器的性质,而只有国家选择使用节点优势和断线能力达到目的并损害他国利益时,这两个元素才被转化为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本部分将主要解释这二者被赋予攻击性权力的逻辑过程以及权力的类型,下一部分则将介绍不同权力所产生的具体政策形态。

在与其他节点及结构的互动关系中,节点的能力(而非权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②第三个方面与本文所探讨的相互依赖武器化之权力来源的逻辑最为相似。第一,决定准入(access)的能力。对于该能力,如轴点国家不给予(网络外的)他国准入

①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节点的显著与否可分为中心性和声望两个层次,前者强调在互动参与中处于重要位置,而不强调其方向,后者则由指向该节点的有向联系来判定;对节点中心性的测量可使用度数(degree)、紧密度(closeness)、介数(betweenness)等不同计算方式。

② 参见 Emilie M. Hafner-Burton et al,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3, No.3, 2009, pp.570-573。

资格，后者就无法进入相互依赖网络中，则无利用二者相互依赖攻击对方的可能性；如轴点国家给予他国准入资格，则一方面是对后者的奖励，另一方面双方在这一网络中的相互依赖将由此开始起步，将这种初始关系作为武器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与“准入”的操作相反但效果类似的是“排除”，鉴于相互依赖武器化是针对相互依赖“存量”的操作，从相互依赖体系中“排除”对象国可被视为“武器化”手段，如将某国排除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支付系统。第二，作为网络中间人的杠杆（the leverage of network brokers）的能力。在一个网络中，割点（cutpoint）和桥（cut-edge）是维系网络连通性的关键存在，如在能源贸易网络中，管道中转国家掌控了截止阀和泵站等关键设施，因此具备此种能力。该能力是轴点国家天然拥有或建设所得，赋予轴点国家更大的议价权力，但这一概念并不包含中断或取消杠杆的含义，因此仅拥有该能力并不意味着相互依赖被武器化。第三，发起国退出网络或去链接的能力。过去的研究认为，这一能力通常由网络中处于边缘的节点所使用或威胁使用，以对抗利用其杠杆议价能力的网络中心国家，而网络中心国家退出或去链接的威胁可信度较低。

本文提出，以网络结构中的节点和连线为基础，国家得以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可以被初步划分为“市场型权力”“资源型权力”和“通道型权力”三种类型。

第一，市场型权力。市场型权力一词也被称为市场支配力，最早来源于微观经济学学科，是指公司通过操纵供应、需求或两者的水平来控制市场上商品价格的相对能力。拥有强大市场力量的公司有能力操纵市场价格，从而控制其利润率，并可能具备阻碍新实体进入市场的能力。① 从社会网络的表现形式来看，掌握市场型权力的轴点与其他节点之间以大量指向该轴点的连线相连，并且连线所承载的度值较大，即其具有高入度（indegree）的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在国际贸易中，一个有高入度的国家是一个大量进口国，而具有高出度的国家是一个大量出口国。② 从对象国视角看，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遭受相互依赖武器化打击的国家在双方关系中具有高敏感性。并且，如果对象国在社会网络中难以找到能够与之相连接、同样具有高入度的度中心性的替代节点，则意味着该国在双方关系中还具有高脆弱性。在本文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语境下，市场型权力来自较大规模经济体的消费能力。当行为体掌握市场型权力时，其消费某种商品或服务的规模往往和其他一些小国的生产规模形成数量上的巨大不对等性，从而占据他国某一重要产业的出口和需求的较大比重。因此，超大规模

① Joan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1969, pp.165-175.

② 参见［美］斯坦利·沃瑟曼、［美］凯瑟琳·福斯特《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陈禹、孙彩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1 页。

经济体的市场往往对于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力，对出口方某一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都将产生重要作用。即使对于其他大国而言，超大规模经济体一旦武器化其消费市场，打击力量仍不可小觑。比如在对中国特别是华为的科技打压中，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禁止华为获得 5G 通信设备和服务市场，即是在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作为全球最重要通信网络市场的相关权力，直接服务于打击中国科技行业乃至压制中国发展。

第二，资源型权力。资源型权力与市场型权力相对，指行为体因掌握关键性、战略性资源而成为重要供给方（卖方），其行为能够对其供应方或出口国相关产业产生较大影响。从社会网络的表现形式来看，掌握资源型权力的轴点与其他节点之间以大量从前者发出的连线相连，且连线所传输的资源或数量极多或极为关键，即其具有高出度（outdegree）的度中心性，①难以从网络中找到其结构等价行动者。与强大的市场型权力决定了对象国的高脆弱性乃至高敏感性类似，资源型权力的存在也是对象国难以承受相互依赖武器化后果、无法找到替代供给的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研究长期以来将自然资源视作国家权力或实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斯特兰奇将石油资源蕴含的权力称为结构性权力，②其流动性和资源相对集聚的特性使其具有强大的国际政治属性和影响市场的力量，对于国家而言则体现在全球油气生产、出口大国作为全球油气市场供给方的权力。③ 但需注意，随着全球经济及能源结构不断转型，天然气、稀土、锂、钴等关键矿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除自然资源外，高科技产品、信息技术、劳动力和人才等也正在成为“新战略资源”，因此“资源”概念的原有解释范围也应得到扩展。如果资源供应国以威胁减少或实质减少对对象国的资源供应，以求实现其政治或安全目的，则可被视作运用“资源型权力”实现武器化。

第三，通道型权力。此种权力的出现与相互依赖网络相伴相生，且只能置于相互依赖网络中来理解，即轴点国家凭借其在网络结构的中心位置，能够影响对象国与网络中其他节点的相连程度，直接或间接限制对象国在网络中的活动范围，从而不仅能够改变其所控节点对对象国政策，同时能够改变其他节点对对象国政策和态度。从社会网络的表现形态来看，该轴点掌握了网络中的“割点”或“桥”，具有很高的“介数中心性”（betweenness）。一旦该轴点自身选择退出，将对整个网络的连通性造成严重打

① 如上文所解释的，以国际贸易为例，有高出度的国家节点是一个大量出口国。此外，对外提供的知识产品丰富、输出的人才众多等也意味着在相应网络中具有高出度。

② 苏珊·斯特兰奇所提出的“结构性权力”更类似塑造国际规范的能力，而与本文提出的“资源型权力”有较大区别，此处举例仅意在说明能源资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认为是一种权力。

③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220-243 页。

击，而一旦选择不让某一个行动者“由此通行”，则将对后者在该网络中的可通行程度造成严重打击，影响后者与其他节点继续相连，该效应也被总结为“扼流闸阀效应”（chokepoint effect）。① 通过阻止对象国与其他节点相连，该权力决定了对象国无法从其他节点中获取资源或市场，也因此决定了对象国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再进一步而言，通道型权力可区分为物质性通道型权力和非物质性通道型权力。比如，传统贸易网络中，关键交通枢纽国家掌握物质性通道型权力，一旦禁止某对象国通行，则将阻碍后者与他国贸易或增加其贸易成本。再比如，全球支付系统中的贝宝（Paypal）、Visa 等各支付平台、通信网络中由光纤、光缆连接的基站等均属于具备物质性通道型权力的节点。除物质世界中存在此种通道和通道型权力外，非物质性通道型权力也随着日益繁复细致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诞生和演化，如保险、信用评级等成为行动者在网络中“通行”的必需品，某一行动者唯有首先通过该节点，才能继续与其他行动者相连，提供此类凭证的机构所控节点因而成为网络中的关键轴点。显然，通道本身如无人通行就没有意义。同样，纯粹的航道、保险甚至金融交易等“通道”所构成的网络（航道网络、支付平台网络）仅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层次，只有当这些节点和不同层次网络相互连接，而使“通道”成为经济交换的关键中介时，通道型权力才会形成。

表 1　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来源类型

| 名　称 | | 轴点形态特征 | 轴点的现实案例 |
|---|---|---|---|
| 市场型权力 | | 与其他节点间以大量指向该轴点的连线相连，且连线承载的度值较大，具有高入度 | 美国的通信网络市场 |
| 资源型权力 | | 与其他节点间以大量由该轴点发出的连线相连，且连线承载的度值较大，具有高出度 | 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供应 |
| 通道型权力 | 物质性 | 掌握网络中的“割点”或“桥”，具有高介数中心性 | 航道、基站 |
| | 非物质性 | | 保险、信用评级 |

注：表由作者自制。

即使在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网络尚未形成前，本文所介绍的前两种权力——市场型和资源型权力，在国家双边关系中也已有体现，并在经济竞争中被作为国家博弈的

①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pp.54-56.

工具。这两种权力概念与市场供需两端的买方权力与卖方权力相似，但为了明确区分双边经济关系和网络中的多边经济关系，本文引入了新的概念表达。双边的经济竞争行为只能对某一明确的对象国造成相对有限的打击，而无法借由其他国家对网络的依赖限制对象国与其他国家关系，进而产生更显著打击。在全球经济网络形成后，各个节点即使不相邻，也仍然相连，相互依赖依旧存在。因此，掌握市场型权力和资源型权力的轴点国家行为不仅对网络中所有与之直接相连的国家产生影响，还会波及其他间接相连的节点，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其“武器化”的效果因经济网络的存在而被放大。

在复杂的相互依赖网络中，一方面，如果各权力轴点被不同国家所控制，则会出现相互制约的情况。如具备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资源型权力轴点受制于国际保险、金融、航运等方面的通道型权力轴点，并与需求国市场型权力之间具有相互补充且相互制衡的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某一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权力，其政策通常是将几种权力组合，以发挥更大作用。比如，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所提出的“布鲁塞尔效应”，就体现出非物质性通道型权力和市场型权力的结合。由于欧盟组成的欧洲单一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消费能力最强的市场之一，世界各国跨国公司脱离欧洲单一市场都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可见欧盟具备市场型权力。为进入该市场，企业不得不接受欧盟在经济、数字、劳工、环境等方面的标准规定，即从欧盟的“标准”通道通行后方可进入该市场。以此为基础，跨国企业为全球提供产业和服务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后又不得不进行标准化生产和经营，因而最为苛刻的欧盟标准规则被“出口”到世界各地，进一步塑造全球规则向对欧盟有利的方向发展。①

（三）权力体现：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政策工具

市场型权力运用的核心在于发起国减少或切断其与对象国市场间的联系，削弱对象国“出口”能力，削减其在发起国的盈利。在贸易领域，运用市场型权力的政策主要包括加征关税、限制产品价格和禁止参与公共采购等，前二者间接或直接影响了对象国向发起国市场出售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从而影响其在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力，而后者则直接取缔供应商参与本市场公共采购竞争的资格。在金融领域，发起国对对象国的投资审查、阻止跨境并购、禁止其发行相关证券或货币的市场工具等也同样属于对市场型权力的运用，此类政策则聚焦于减少或切断对象国与发起国“资本市场”间的联

① 参见 Anu Bradford，*The Brussels Effect：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pp.123-125。

系。

运用资源型权力的政策同样体现在多个领域。其一,出口管制政策是应用资源型权力的最常见政策,如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促进外交政策目标为由,推出《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EAR)、《武器出口管理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AECA)等,要求相关物项交易需获得许可审查例外,同时限制对象国从美国和从第三方获得相关资源的能力。其二,与市场型权力相对,金融领域同样存在运用资源型权力的政策,主要为禁止向特定地区或对象国特定行业投资。此外,切断向对象国供应信息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服务资源等同样属于此类政策常用工具,如停止与对象国的税务情报信息交换将对其国际税收征管产生影响。

运用通道型权力政策的主要逻辑是限制对象国通过、离开或使用发起国所掌握的轴点。在物质性通道型权力中,主要有三方面体现:一是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包括签证吊销、禁令,限制对象国公民前往发起国,以及限制在发起国当地的对象国公民离境;二是对物资产品运输的限制,如直接在管道运输中启动截止阀、停用泵站,或间接提高过境费以改变供应商或客户行为;①三是对交通要塞的控制,如禁用关键航道、停靠码头或拦截扣押等。运用非物质性通道型权力的政策工具则限制行为体从其掌握的非物质性轴点通行,常见工具包括禁止提供保险、经纪服务、技术认证、金融传输服务、降低信用评级,以及禁止使用关键知识等。根据以上例子,这样的政策工具虽然调用的是非物质性网络(如知识网络)中的轴点权力,但却服务于限制物质世界中的"通行"目标。其作用机制类似于给予经由该轴点的行动者在该网络中持续活动的"通行证",当后者无法得到该轴点背书时,则将因行为不规范、信任缺失等问题而难以与其他节点继续相连。

表 2 相互依赖武器化不同权力类型的主要政策工具

| 权力类型 | 主要政策工具 |
| --- | --- |
| 市场型权力 | 增加关税征收;产品价格限制;参与公共采购限制;投融资、跨境并购限制等 |
| 资源型权力 | 增加出口管制、禁止转运;禁止向对象国投资;停止情报、税务等信息交换等 |

① 参见 Emily Meierding, "Weaponizing Energy Interdependence," in Daniel W. Drezner,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ed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pp.169-184。

| | | |
|---|---|---|
| 通道型权力 | 物质性通道型权力 | 人员流动限制(签证撤销、停发等);运输管道停用、提高过境费等;禁用关键航道、停靠码头、拦截扣押等 |
| | 非物质性通道型权力 | 禁止提供保险;禁止提供经纪服务、金融传输服务;停用技术认证、降低信用评级等 |

注:表由作者自制。

(四)小结

本部分从发起国视角出发,解释了国家得以武器化相互依赖的三层次逻辑。首先,当今世界复杂紧密的相互依赖网络中节点和连线的存在、分布和特性,是国家得以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来源;其次,掌握节点优势和潜在断线能力的国家因而可能具备市场型、资源型和通道型三种类型权力;最后,国家能够利用这三种权力制定和实施各类政策措施,唯有当政策生效时,相互依赖才真正被转化为一种国家相互博弈的工具。当然,基于相对于发起国在网络中的不对称地位,对象国将遭受损失(敏感性),并难以寻找替代(脆弱性)。

既有研究评估相互依赖武器化的程度或其效果时,通常从对象国视角出发,探究其敏感性和脆弱性有多大,而本文所提出的发起国视角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补充路径,即测量发起国所掌握的权力大小及其对反噬效果的承受能力大小。针对某一网络,本文提出的分类框架能够用于确定哪个轴点国家在该网络中具备何种权力。就三种权力类型而言,对市场型权力和资源型权力的测量依赖于度值,度值越大则权力越大;对通道型权力的测量则应关注其是否为必须经过的、无可替代的通道,即观察网络中是否还存在结构等价①的其他轴点。通过使用这一分析框架,一方面,潜在的对象国能够预测大国发起相互依赖武器化所调用的权力和使用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潜在的发起国能够预先考虑对象国是否也具备某一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从而评估因主动行动而遭到反击的可能性及其后果。

除国家行为体之外,其他行为体的反应也将影响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效果。在国家内部,国内利益相关者对相互依赖的态度与其经济利益相挂钩,在不同情况下对于是否调用本文提出的三种权力实施武器化政策的意愿亦有不同,这将决定决策者能否推行实施切断或削弱与他国相互依赖的政策。在国家之外,跨国公司行为会受到母国、主要大国的影响,其对发起国政策的跟随与否、跟随程度也将对发起国政策效果产生

① 如果两个节点在结构上等价,则它们与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关系完全一致。

巨大影响。一方面，掌握相互依赖武器化权力的国家不仅会对对象国推行直接措施，部分国家还会同时颁布次级制裁措施，对第三国发起单边长臂管辖，一旦违反其措施，跨国公司就将面临罚款、起诉、资产冻结和扣押等，因此只能在对象国和发起国之间“二选一”。另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抗在大国关系中愈发显著，跨国公司特别是西方企业需要重视在母国或主要市场的“政治正确”问题，否则其产品或服务竞争力将因公众声誉下降而受到巨大损失，因此，跨国公司有时会主动放弃在对象国的经济利益，做出限制性措施之外的过度合规姿态。

## 四 案例研究

在全球经济复杂网络中，不同国家所处位置不同，在相互依赖中所掌握的权力类型不同，最终采取的政策也因国内情况、对象国反应等而异。本文很难从提出的理论框架中生成先验预测的单一案例，来直接测试上文框架的可靠性。此外，由于本文所提出“三层次”权力逻辑中不仅包括可计算的相互贸易、投资量等，还包括国际规范、影响力、知识信息等不便进行量化研究的要素。因此，本文选择使用典型案例对上述框架进行论证和进一步解释。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是近年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其制裁措施繁杂，权力来源和理论依据难以辨别。本文选择探讨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俄罗斯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作为论证本文所提出的相互依赖武器化机制的案例。两个案例的发起主体虽然均为欧盟及其成员国，但在不同时间段中所调用的权力却有所不同。

接下来，本部分将在两个案例中首先介绍相互依赖武器化发生的背景、目标、原因等；随后，将根据上文提出的三层次权力逻辑，识别案例中发起国得以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基础、权力来源和权力体现。由于发起国掌握不同权力类型均基于相互依赖网络中的“连线”和“节点”结构，本部分将减少对武器化相互依赖权力基础的重复说明。

### （一）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欧盟对俄罗斯的相互依赖武器化

在 1954 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以前，该地区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俄罗斯也始终将该地区视为本国的一部分。2014 年 2 月，俄罗斯军队进入克里米亚，俄乌冲突由此开始。1 个月后，克里米亚地区举行全民公投，97%的民众投票支持该地区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自 1994 年欧盟与俄

罗斯达成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起,近 20 年来,双方在政治对话、经济合作、教育、研究、文化、投资、能源等方面均建立了深厚的相互依赖。随着欧盟认定俄罗斯的行为"违反国际法,是对国际安全秩序的挑战",欧盟便利用双方的相互依赖对俄罗斯发起一系列制裁行动。欧盟的行动与本文所提出的相互依赖武器化行为相吻合,其所运用的权力类型以资源型权力为主,以通道型权力为辅。

在此番制裁行动中,欧盟所调用的资源型权力主要来源于其资本和技术实力。欧盟是俄罗斯的主要外国投资者,2013 年欧盟国家(含英国)的直接投资在俄罗斯总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为 68%,2014 年该数据则为 71%。① 欧盟有关金融方面的制裁措施抓住这一关系特点,禁止为与俄贸易或在俄投资提供公共资金、财政援助,禁止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相关法人、实体或机构进行收购或投资,不再向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提供贷款等。②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精英对欧盟资本市场的依赖度更高,③因此,欧盟专门列出受制裁个人名单,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该措施不仅具有政治意涵,也是欧盟运用其资源型权力对俄精英予以打击的体现。技术资源是欧盟企业所掌握的另一优势,在军用设施、能源生产等方面,相对于俄罗斯,欧盟拥有资源型权力。在克里米亚危机背景下,欧盟和美国一旦选择减少或停止向俄提供技术资源,俄罗斯将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自主研发或找到其他同等水平技术提供者。并且,当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开发北极、深海和页岩油储备的起始阶段,亟须继续依赖于美欧所提供的技术资源。在对俄制裁措施中,欧盟规定如运营商要向俄罗斯出口能源相关设备,则必须得到成员国主管部门的事先授权,且明令禁止向俄罗斯提供深水石油勘探和生产、北极石油勘探或生产、页岩油项目所需的钻井、测井等服务。④ 此外,欧盟还规定了对俄罗斯实施武器、军民两用产品以及相关材料和科技禁运,禁运范围涵盖了欧盟共同军事清单(common military list)当中的所有项目。⑤

为配合其资源型权力使用效力,欧盟也同步运用其通道型权力,如禁止提供金融

① Zsolt Darvas et al, "EU Trade and Investment following Russia's Illegal Invasion of Ukraine," European Parliament, July 20, 2023,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EXPO_STU(2023)702591.

② Council Regulation (EU) No 833/2014, July 31, 201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02014R0833-20240224.

③ 参见 Marta Domínguez-Jiménez and Niclas Poitiers, "FDI Another Day: Russia Reliance on European Investment,"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Issue No.3, February 17, 2020。

④ Council Regulation (EU) No 833/2014.

⑤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doption of Agreed Restrictive Measures in View of Russia's Role in Eastern Ukraine," July 31, 201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2019/144205.pdf.

经纪业务服务，属于非物质性通道型权力，以配合其停止向俄提供金融资源的举措。欧盟还对个人和实体进行旅行限制（签证禁令）、资产冻结等。由于欧盟运用该权力所针对的行为体是个人，因此其实际效果也相当有限，更多是出于政治和象征意义，确保“他们的钱不能再用于支持俄罗斯政权”，而非旨在对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经济损害。①

针对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制裁措施与针对 2022 年乌克兰危机措施的最大不同在于，欧盟未大幅调用其在能源方面对俄罗斯的市场型权力。由于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资源依赖程度极高，在其掌握市场型权力的同时，俄罗斯也相应掌握一定程度的资源型权力。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 年，欧盟三分之二的原油进口（30.4%）、四分之三以上的天然气进口（37.9%）以及近四分之三的煤炭等固体燃料（29%）来自俄罗斯。② 可见，即便欧盟作为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一大买家，具有市场型权力，其对俄罗斯能源的高依赖性也说明了俄罗斯拥有资源型权力。在这一波制裁中，欧盟未能预备能源短缺的应对和替代方案，因此难以调用其市场型权力。

（二）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欧盟对俄罗斯的相互依赖武器化③

由于无法摆脱冷战的历史性影响和地缘政治的结构性束缚，欧俄双方始终在安全矛盾与经济合作之间摇摆。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欧愈发将俄罗斯定位为西方的严峻安全挑战，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使欧俄矛盾成为欧亚大陆上最为凸显的一对矛盾，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复杂博弈交织其中。欧盟各国不仅希望改变俄对乌政策、结束此次冲突，还希望借机打压俄军事实力和国家能力，因此联手对俄施加所谓毁灭性的、前所未有的制裁。

在此次危机反应中，欧盟对俄罗斯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来源覆盖本文提出的三种类型。其一，欧盟对俄在诸多领域都掌握强大的市场型权力。2021 年（危机升级前一年），欧盟自俄罗斯进口 1585 亿欧元货物，主要为矿物燃料、木材、钢铁和化肥。④其中，对欧能源出口对俄罗斯国家收入意义重大，2021 年欧洲占俄原油出口的 60.5%

① Council Regulation (EU) No 833/2014.

② “Shedding Light on Energy in the EU: A Guided Tour of Energy Statistics,”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interactive-publications/energy-2024.

③ 本部分中欧盟对俄罗斯所施加限制性措施，参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欧盟相关网页：Chad P. Bown, “Russia's War on Ukraine: A Sanctions Timelin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ecember 31, 2023,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russias-war-ukraine-sanctions-timeline; “EU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since 2014),” European Council/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sanctions/restrictive-measures-against-russia-over-ukraine/#sanctions。

④ 数据来自欧盟委员会网页：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russia_en。

和天然气的 60.4%。① 而自 2022 年 2 月以来，欧盟先后发布 11 轮一揽子制裁措施，限制或禁止了从俄罗斯进口的水泥、橡胶制品、木材、酒类、高端海产品、钢铁、石油、煤炭、贵金属等原料和产品，制定“2022 年底前将俄天然气进口同比减少 2/3”目标和行动计划，力图减少俄罗斯贸易收入，扭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削弱其综合实力。欧盟法规与行动对跨国公司有较强规范力，欧盟市场型权力所产生的效果甚至超过其政策本身。除了欧盟明确将违反限制性措施的决定列入《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中的“欧盟罪行”清单之外，②部分跨国公司还出于政治立场和企业声誉考虑，采取“过度合规”的姿态，在政府发表声明前主动选择剥离涉俄业务。

其二，欧盟向俄出口的“资源”虽不算多，但欧盟此番对俄行动希望全面切断与俄联系，尤其希望对俄军事力量和决策层形成精准致命性打击，因此，在诸多领域继续扩大调动其资源型权力。为打击俄罗斯军事力量，欧盟禁止向俄出口军民两用物项和技术、半导体材料、电子和光纤元件、导航仪器、无人机发动机、武器和民用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军用车辆和准军事装备等。为改变和打击俄罗斯决策层，欧盟禁止公民和企业向部分被认为“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俄罗斯寡头和政客提供资金，并对奢侈品施加贸易出口限制。③ 此外，欧盟在技术、服务、信息等资源供应上也做出限制规定，包括禁止对俄罗斯出口航空、海运等部门物项和技术；禁止向俄提供建筑工程、信息技术、法律和广告等服务；④部分欧盟国家停止与俄罗斯进行税务信息互换等。⑤

其三，无论在物质还是非物质性网络中，欧盟都占据金融、交通运输、保险、信用评级等重要节点，加之七国集团盟友对欧盟行动的支持，欧盟通道型权力在对俄罗斯相

① 董一凡：《欧盟能源安全政策调整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 11 期，第 26 页。

②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Sanctions: Council Requests European Parliament Consent to Add the Violation of Restrictive Measures to the List of EU Crimes,” June 30,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6/30/sanctions-council-requests-european-parliament-consent-to-add-the-violation-of-sanctions-to-the-list-of-eu-crimes/.

③ Council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2/427, March 15, 2022,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427/oj.

④ European Council/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EU Adopts 9th Package of Economic and Individual Sanctions,” December 16,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12/16/russia-s-war-of-aggression-against-ukraine-eu-adopts-9th-package-of-economic-and-individual-sanctions/.

⑤ Shaun Courtney, “Countries Stop Sharing Tax Info in Ongoing Russia Sanctions,” *Bloomberg Tax*, April 21, 2022, https://news.bloombergtax.com/daily-tax-report-international/countries-stop-sharing-tax-data-in-ongoing-russia-sanctions.

互依赖武器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显著。在物质性通道型权力方面，欧盟限制受制裁个人进入或经过欧盟领土，并冻结其资产，即限制其从欧盟交通节点和金融节点通过，从而影响其涉欧出行和交易。此外，欧盟在贸易领域物质性通道型权力的运用与其市场型权力形成配合，如推出油船和转运船只进入欧盟港口和船闸、公路运输货物的禁令。[①] 在非物质性通道型权力方面，欧盟一是禁止欧盟证券交易所上市俄罗斯国有企业证券或提供相关业务，阻断俄罗斯进入欧盟资本市场的通道。二是将部分俄罗斯银行踢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支付系统，[②] 使俄罗斯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脱钩。三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合作伙伴协调，要求各信用评级机构停止向任何俄罗斯个人或实体提供服务，[③] 一旦机构违反该禁令，将面临失去在欧盟经营许可的风险。随着惠誉评级、穆迪和标准普尔等占据垄断地位的评级机构停止向俄企提供服务，或者把俄罗斯政府债务评级下调至最低级，投资者将资金投向俄企的意愿大大下降。四是拒绝提供海运服务及保险服务，[④] 使俄罗斯无法使用无保险或低于国际标准的船只在他国海域航行或靠港。

## 五 余论

本文从发起国视角出发，补充分析国家何以能够将相互依赖作为相互博弈的工具，提出发起国“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基础是其在相互依赖网络中所处的不对称地位，即其轴点优势和断线能力，二者衍生出资源型权力、市场型权力和通道型权力三种更具体的权力类型，并最终通过政策制定反映出来。

相互依赖武器化现象在现实中正不断涌现，但在学理上未解决的问题仍有许多。本文仅从发起国角度展开初步探究，但未能对各种权力类型在单一使用、相互组合叠加时的强弱效果进行评估。如果将相互依赖武器化这一工具与其他政策工具相比较，

① European Council/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EU Adopts 11th Package of Economic and Individual Sanctions,” June 23,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6/23/russia-s-war-of-aggression-against-ukraine-eu-adopts-11th-package-of-economic-and-individual-sanctions/.

②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n Further Restrictive Economic Measures,” February 2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2/26/joint-statement-on-further-restrictive-economic-measures/.

③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Russia’s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Fourth EU Package of Sectoral and Individual Measures,” March 15,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3/15/russia-s-military-aggression-against-ukraine-fourth-eu-package-of-sectoral-and-individual-measures.

④ 欧盟还同时提出“限价令”，只为售价低于 60 美元/桶的俄石油提供运输和保险服务，这一措施发挥了欧洲“保险中心”的轴点作用，力图控制俄罗斯油船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易，直接削减俄能源收入。

国家为何选择这一政策工具而非其他？各工具使用效果孰强孰弱？国家是否正在有意识地培养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权力？发起国使用该工具在短期和长期内，对对象国经济政治、本国声誉、国际关系的影响又将是什么？对发起国又有怎样的反噬效应？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答。

相互依赖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在过去数十年来与全球化进程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然而，随着全球经贸保护主义泛滥、新冠疫情暴发以及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甚至在部分领域出现逆转和倒退。随着大国博弈中相互依赖武器化行为的增加，各方针对经济全球化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认知会发生更多变化，一些国家将逐步倾向于从政治化和安全化的角度考虑经济合作问题，将经济问题与地缘政治挂钩，彼此之间的信任将严重受挫。即使各方不会急剧降低相互依赖的程度以防范风险，进一步深化相互依赖的意愿和动力也会遭到削弱。这意味着迟滞甚至逼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力量趋于增强，全球经济版图和产业关系或将面临区域化、阵营化和碎片化的发展态势。相互依赖武器化已成为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确保经济安全、运筹对外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中国应正视这一现象，做好科技、经贸、金融等领域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并为全球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源头活水。一是尽快完善相应政策工具箱应对相关挑战；二是需要在关键领域梳理和评估风险敞口，通过增强自主能力、持续加强与世界的联通等方式对冲相关风险；三是继续以高质量经济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开放与各国分享红利，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发展。

（作者简介：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叶潆，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董一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海洋）

industry have been intensified.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t seeks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for such competition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China-Europ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s well as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countermeasures. Empiric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bilateral dispute lies in China's competitive edge and strategic advantages in electric vehicles and batteries, which is, in fact, not about distorting the market, as claimed by the EU. Driven by concerns over potential setbacks and job losses in its automotive sector amid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EU has implemented measures such as exclusive purchase subsidies and vertical industrial policies in order to safeguard domestic industry and respond to the impact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sector. In the futur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ppears inevitable, ye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cooperation.

## 63 An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Sources of Power and Policy Practices

SUN Chenghao WANG Yexu DONG Yifan

The world's understanding towards interdependence is shifting towards a prevailing sense of "insecuri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cent emergence of the so-called "weaponiz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and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itiating country,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a nation's ability to convert interdependence into confrontational tool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itiating nation's strategic advantage within the interdependent network and its capacity of strategically severing ties constitute the bedrock of power upon which this weaponization rests. These forms of power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that is, market-based, resource-based and channel-based power, and the country that weaponizes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 employs different policy tool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three types of power. In the case study, the authors select two highly publicized and differentiated cases concerning how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weaponized their interdependence with Russia at different periods to certif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posed by this article.